

南宋 文化与旅游

The Cultur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ourism

主 编：林正秋 王信章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 编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一宾

封面设计：陈小波

ISBN 978-7-89429-086-1



9 787894 290861 >

定价：80.00 元

南宋 The Cultur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ourism 文化与旅游

主 编：林正秋 王信章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南宋文化与旅游

主 编:林正秋 王信章

责任编辑:王一宾

技术编辑:书道文化

封面设计:陈小波

出版发行: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 25 号

联系电话:010-61265727

邮 编:10260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89429-086-1

定 价:80.00 元

目 录

序 / 李 虹	1
以杭州(临安)为例 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 王国平	3
南宋临安府的饮食文化与旅游 / 朱瑞熙	20
打造南宋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杭州典范 / 沈祖祥	24
过南宋皇城遗址(诗) / 蔡云超	24
名城印象:南宋诗人眼中的扬州与杭州 / 孔祥军 高永青	25
宋白真人玉簪——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本土文化的再认识与借鉴 / 丁 翔	30
南宋军寨的文化旅游资源 / 金崇尧	40
僧人的云游生涯与当代济公文化之旅——以南宋禅僧济公为中心 / 许尚枢	45
南宋贤相吕颐浩与台(临)著名文化名人	
——杭州与临海应辟一条南宋名人古墓(祠)旅游线 / 丁式贤	62
《南宋都城临安梦幻图》与杭州文化经典 / 刘佐尹 吴小红	68
儒风长存——衢州孔庙 / 余 璩	74
南宋“朱唐案”及相关故事景点 / 陆绎广	79
《促织经》: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 / 周 琦	82
南宋帝王将相与西湖游赏 / 林正秋 林 琳	87
南宋杭州西湖的游乐习俗 / 林正秋	93
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 / 胡效琦	99
试析杭州为休闲之都的历史渊源——南宋临安休闲文化考察 / 康保岑	101
南宋官窑博物馆建设的 10 点构想	
——兼论打造一张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南宋陶瓷文化“金名片” / 华雨农	109
南宋商贸旅游的传承与复兴	
——打造南宋特色街区的思考 / 陈 跃 吕永操 何奈里	112
杭州旅游要进一步彰显南宋文化元素 / 吕洪年 翁迪明	119
试论“西溪”名称的多重含义及其演变	
——以南宋文献中所记载的杭州“西溪”为中心的考察 / 范今朝 刘姿吟	124
杭州市街巷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探析 / 郑 卫 魏柳玥 周俊涛 叶梦瑶	136
两宋疆域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以两宋题咏洛阳诗词为中心的考察 / 何沛东	141
梳理南宋以来杭州“五大水系”的舟船文化 / 吕洪年	146
继往开来——透视西湖园林 / 邹身城	153
南宋名园今犹存 今日名园更胜昔	
——南宋以来西湖名园的文脉传承和旅游发展 / 仲向平 郝建民	158

西湖游船——杭州休闲活动的重要载体 / 周复多	162
南宋姚斗门桥遗迹是杭州重要的旅游资源 / 陈 琚	165
南宋临安战事及现存涉军文化遗迹 / 盛久远	171
简说南宋时期杭州的旅游 / 张志明	175
旅游文化在南宋京都临安兴盛的缘由 / 葛许国	177
杭州南宋皇城遗址与零旅游 / 周进步	180
长袖善舞古都杭州的南宋文化旅游 / 戎玉中	183
南宋都城文化与旅游发展——以宋城为例 / 黄天美	194
挖掘西溪辇道旅游资源 再现南宋城郊民俗风情 / 郑发楚	200
南宋杭州诗词与当代杭州旅游 / 吴亚卿	206
从“西湖是一本书”说开去 / 应守岩	225
南宋文学与杭州旅游发展 / 洪淳生	236
陆游与严州的文学情缘 / 朱睦卿	241
寻觅与重现——记南宋杭州书画与西湖情愫 / 谢西岑	251
大力弘扬水浒文化 促进杭州旅游事业 / 马成生	257
论杭州与“水浒”文化旅游——杭州《水浒》文化旅游的思考与建议 / 张振萍	263
南宋佛教文化的价值理念与杭州宗教旅游的开发前景 / 章胜利	267
打造“东南佛国”品牌 弘扬杭州佛教文化——兼论杭州佛教文化与旅游 / 陈培章	276
南宋茶事与杭州旅游 / 张幼泉	283
南宋文化 无价之宝 / 倪焕真 朱 琪	293
流传在杭州民间的南宋文化 / 单金发	297
南宋临安游园赏花文化 / 汪孙聚	302
勾庄曾有古行宫——寻访南宋宗室游春踏青的行迹 / 丁云川	312
杭州“宋文化”旅游开发 / 龚玉和	314
走读南宋——开辟长三角南宋怀古水上旅游线小议 / 朱祥林	330
宋室南迁对杭州城东的影响——兼谈杭州城东一日游设想 / 顾国泰	335
南宋文化与皋亭山景区旅游资源 / 徐守成 谢锦堂	342
南宋文化与临安旅游内涵挖掘 / 唐剑平	349
民族英雄贾涉应融入南宋古都旅游文化 / 陈 伟	352
南宋皇城“四至”范围及格局考辨 / 马顺尔	355
探视南宋社会的窗口——试论宋六陵考古 / 裘本培 裘禾敏	382
岳飞与于谦 杭州的骄傲 / 于立岳	386
南宋时的西湖游船 / 吴仙松	392
南宋中华传统武术寻根游 / 高 健	393
南宋初“苗刘兵变”始末 / 刘大华	398
韩世忠放胆破苗刘 韦太后困惑“寺里寺” / 周如汉	401
孝女路应恢复历史古迹 望建一座张宪骑战马的英雄雕塑 / 林汝狄	406
大资福庙开展清明纪念张宪活动的建议 / 胡鲁昌	409
800年后 城南让我们再一次迷醉(散文) / 俞宸亭	411
附:保护古都文化 发展现代旅游——杭州行动纲领	420



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城市的根和魂。

南宋立国 153 年，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发展达到了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定都在临安（今杭州），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灿烂，给杭州这座城市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今天杭州人的文化特质、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仍保留着南宋的历史印迹。南宋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杭州历史的里程碑；在当时南宋疆域内的各个地区，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受惠和发展机遇。

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成果的反映，南宋时的旅游也很繁盛，尤其是都城临安。《武林旧事》中《西湖游幸·都人游赏》有专门记述：“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皆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这给后来的旅游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与内涵，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与平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增长，旅游的空间得到了大范围的拓展，旅游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旅游的品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旅游正成为人们品质生活的一种方式，而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或者叫体验文化的旅游，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向往和追求，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以杭州为例，“十二五”目标是初步建成“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在此期间，杭州旅游产品开发要实现由观光产品为主进一步向观光、休闲、度假、会展等全方位、多样化的产品体系转变；从自然文化观光游览、主题公园等传统产品向都市旅游、会奖旅游、运动休闲、健康养生、文化休闲、生态度假等方向发展，并力争形成三大王牌产品（水韵杭州、经典古都、东南佛国）、六大专项产品（都市旅游、会奖旅游、运动休闲、健康养生、山水度假和文化休闲）。

事实证明，文化旅游消费水平乃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旅游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要处理得好，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全可以达到“保护文化，促进旅游”的双赢目的；若处理不好，不但会损害文化遗产，也不利于旅游的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把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单纯追求旅游人次和经济收益上，而应当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放在首位，不断加强文化与旅游的相互融合，积极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大力挖掘特色旅游文化，利用和整合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树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三统一”的最大值。

要做到这一点，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杭州而言，就是要对杭州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南宋文化，对蕴含在各个景点的人文历史与传说故事，不光是专家学者熟知和研究，也要让旅游从业人员熟悉和运用，还要让更多的杭州市民了解和关心，大家用自己对抗州的了解，用自己心中对抗州这座城市的热爱，通过和中外游客的交流以及他们能看懂的方式，将杭州的历史文化充分表现出来，那末，他们对抗州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

出于这个考虑，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和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南宋文化与旅游研讨会”，会前发动与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研究者撰写了 60 余篇论文，并入编这部论文集，不仅代表了撰稿人长期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南宋文化与旅游”研究的新动向。我相信，这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发掘与弘扬包括南宋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南宋文化研究走向深入，促进杭州与兄弟城市及相关地区旅游业的更大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以杭州（临安）为例 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从“南海一号”沉船发现引发的思考

王国平

2007年12月22日，举世瞩目的我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根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金、银、铜、铁、瓷器文物可能达到8万至10万件，均为稀世珍宝。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现过如此巨大的千年古船。“南海一号”的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堪称一大奇迹，也填补与复原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空白。不少专家认为“南海一号”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这艘沉船虽然出现在广东海域，但却反映了整个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标志着南宋社会的开放，也表明当时南宋引领着世界的发展。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的古都临安（即今杭州），则是南宋这种繁华与开放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以临安为代表的南宋繁荣与开放，就不会有今日“南海一号”的发现；而“南海一号”的发现，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与评价南宋，带来了最好的注解，最硬的实证。

提起“南宋”，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曾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上的诗，当作是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虽然，近现代已有海内外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南宋”，但相当一部分人仍认为南宋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文化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王朝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导致这种“历史误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坐在历史的成见之上人云亦云。只要我们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态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南宋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将南宋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南宋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不难发现南宋对中华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而对南宋作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北宋京城开封。次年三月，俘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建炎三年（1129）二年，高宗来到杭州，改州治为行宫，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此时起，杭州实际上已成为南宋的都城。绍兴八年（1138），南宋宣布临安府为“行在所”，正式定都临安。自建炎元年（1127）赵构重建宋室，至祥兴二年（1279）赵昺灭亡，共153年，史称“南宋”。

我们认为，研究与评价“南宋”，不应当仅仅以王朝政权的强弱为依据，而应当坚持“以人为

本”理念，以人们生存与生活状态的改善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许多人评价南宋，往往把南宋王朝作为对象，我们认为所谓“南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王朝的“称谓”，而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未来理想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这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作为评价一个历史阶段的根本依据。南宋时期，虽说尚处在封建社会的中期，人的自由与发展受到封建集权思想与皇权统治的严重束缚，但南宋与宋代以前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对人的生存与生活的关注度以及南宋人的生活质量和创造力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研究与评价“南宋”，不应当仅仅以军事力量的大小作为评价依据，而应当以其社会经济、文化整体状况与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重要标准。我们评判一个朝代，不仅要考察它军事力量的大小，更要看其在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宋朝立国 320 年，虽不及汉唐、明清国土辽阔，却以在封建社会中无可比拟的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跻身于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列。无论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南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也都处于领先地位。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止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研究与评价“南宋”，不能仅仅以某些研究的成果或所谓的“历史定论”为依据，而应当从其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作为重要标准。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朝代，也是封建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南宋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三左右，但却维持了长达 153 年（1127—1279）的统治。南宋不但对中国境内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南宋王朝负面的影响，更要充分肯定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一、在政治上，既要看到南宋王朝外患深重、苟且偷安的一面，更要看到爱国志士精忠报国、南宋政权注重内治的一面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外患严重之至，不时地受到北方金朝、蒙元的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长期威胁着南宋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在此情形下，南宋初期朝廷中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积极议和，向女真族纳贡称臣，南宋王朝确实存在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一面。但也要承认南宋王朝大多君王始终怀有收复中原的愿望。南宋将杭州作为“行在所”，视作“临安”而非“长安”，也表现出了南宋统治集团不忘收复中原的意愿。我们更应该看到南宋时期，仅一百五十三年，却涌现了岳飞、文天祥两员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一大批爱国将领，数百名爱国仁人志士，这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比拟的。同时，南宋政权也十分注重内治，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崇

尚文治”政策、倡导科举不分门第等方面均有重大建树。主要表现在：

1、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时代。南宋王朝前有金朝、后有蒙元，面临强大的对手，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艰苦卓绝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和民族英雄。我们认为：

南宋是面对强敌、英勇抗争的时代。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匈奴、突厥、契丹以后，一个十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并非昔日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与明清时期的蒙古可比。金军先后灭亡了辽朝和北宋，南侵之势简直锐不可挡，但由于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虽屡经挫折，终于抵挡住了南侵金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外患深重的困境中站稳了脚跟。在持久的宋金战争中，南宋的军事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南宋后期的蒙元军队更为强大，竟然以 20 年左右的时间横扫了欧亚大陆，全世界为之谈“蒙”色变。南宋的军事力量尽管相对弱小，又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蒙元军队，但其广大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抵抗了整整 45 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抗击蒙元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南宋是呼唤英雄、造就英雄的时代。在旷日持久的宋金战争中，造就了以宗泽、韩世忠、岳飞、刘锜、吴玠吴玠兄弟为代表的一批南宋爱国将领。特别是民族英雄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更是使金军闻风丧胆。在南宋抗击蒙元的悲壮战争中，前有孟珙、王坚等杰出爱国将领，后有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张世杰等抗元英雄，其中民族英雄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更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南宋是激发爱国热忱、孕育仁人志士的时代。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 277 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南宋初期，宗泽力主抗金，并屡败金兵，因不能收复北宋失地而死不瞑目，临终时连呼三次“过河”！洪皓出使金朝，被流放冷山，历尽艰辛，终不屈服，被人比作宋代的苏武；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表达了他渴望祖国统一的遗愿；辛弃疾的词则抒发了盼望祖国统一和反对主和误国的激情。因此，我们认为，南宋不但是造就民族英雄的时代，也是孕育爱国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沃土。

2、从政治制度上看，两宋时期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支弱”的时期。宋朝在建国之初，鉴于前朝藩镇割据、皇权削弱的经验教训，通过采取“干强支弱”政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南宋时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中央权力上，实行军政、民政、财政“三权分立”，削弱宰相权力与地位；在地方权力上，中央派遣“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将原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在官僚机构上，实行官（官品）、职（头衔）、差遣（实权）三者分离制度；在财权上，设置转运使掌管各路财赋，将原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政权收归中央；在司法权上，设置县尉一职，将方镇节度使掌握的地方司法权收归中央；在军权上，实行禁军“三衙分掌”，使握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与将分离，将各州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里，从而加强了中央对政权、财权、军权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南宋继承了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3、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两宋统治集团始终崇尚文治，尊重知识分子，重用文臣，提倡教育和养士，优待知识分子。与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明清“文字狱”相比，两宋时期可谓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客观上

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政策措施表现在：

推行“崇尚文治”政策。宋王朝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较为宽松宽容的态度，“欲以文化成天下”，规定“对士大夫待之以礼”、“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崇文抑武”大政方针。两宋政权将“右文”定为国策，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参与政治、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宋代思想、学术、文化的大发展。正由于两宋重用文士、优待文士，又不杀文臣，因而南宋时常有正直大臣敢于上书直谏，甚至批评朝政乃至皇帝的缺点，这与隋唐、明清时期的政治状况大不相同。

采取“寒门入仕”政策。为了吸收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两宋对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消除了隋唐以来士族门阀造成的影响。两宋科举取士几乎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再加上科举取士的名额不断增加，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学而优则仕”之风。南宋时期，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如在宝祐四年（1256）登科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占了70%。

二、在经济上，既要看到南宋连年岁贡不断、赋税沉重的状况，更要看到整个南宋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一面

人们历来有一种误解，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带来的“积贫积弱”老毛病。确实南宋王朝由于长期处于前金后蒙的威胁之下，迫使其不得不以加强皇权统治作为核心利益，在对外关系上，以牺牲本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采取称臣、割地、赔款等手段来换取王朝政权的安定。正因为连年向金朝贡，确实加重了南宋王朝财政负担和民众经济负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宋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南宋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给南宋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统治者出台的一些积极措施，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南宋经济繁荣主要体现在：

1、从农业生产看，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政府采取鼓励垦荒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促进了流民复业和荒地开垦。人稠地少的两浙等平原地带，垦辟了众多的水田、圩田、梯田。曾经“几无人迹”的淮南地区也出现了“田野加辟”，“阡陌相望”的繁荣景象。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二三倍，总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有学者将宋代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提高，称之为“农业革命”。宋末元初，江浙行省虽然只是元十个行省中的一个，岁粮收入却占了全国的37.10%，江浙地区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并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2、从手工业生产看，南宋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时期，随着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是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朝，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二是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造型优美，有“饶玉”之称；临安官窑所造青瓷极其精制；龙泉

青瓷达到了烧制技术的新高峰。三是造船业空前发展。漕船、商船、游船、渔船，数量庞大，打造奇巧，富有创造性；海船所采用的多根桅杆，为前代所无。战船种类繁多，功用齐全，在抗击金和抗蒙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从商业发展看，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虽然宋代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但由于两宋时期冲破了历朝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确立了“农商并重”国策，采取了惠商、恤商政策措施，使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商品经济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是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临安、建康（今南京）、成都等全国性著名商业大都市，当时的临安已达16万户，人口最多时有150—160万人，同时，还出现了50多个10万户以上的商业大城市，并涌现出一大批草市、墟市等定期集市和商业集镇，形成了“中心城市——市镇集市——边境贸易——海外市场”的通达商业网络。二是“市坊合一”的商业格局。两宋时期由于城市商业繁荣，冲破了长期以来的作为商业贸易区的“市”与作为居民住宅区的“坊”分离的封闭式市坊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街坊商家店铺林立，酒肆茶楼面街而立，早市夜市通宵经营的繁荣景象。三是规模庞大的商品交易。南宋商品的交易量虽难考证，但从商税收入可窥一斑，淳熙末全国正赋收入6530万缗，占全国总收入30%以上，据此推测，南宋商品交易额在20000万缗以上，可见商品交易量之巨大。南宋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

4、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两宋期间，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隔断，东南方向海路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外贸易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南宋海外贸易繁荣表现在：一是对外贸易港口众多。广州、泉州、临安、明州（今宁波）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与外洋通商的港口已近20个，还兴起了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二是贸易范围大为扩展。宋前，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约20余处，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而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今南海）、西洋（今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三是出口商品附加值高。宋代不但外贸范围扩大和出口商品数量增加，而且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附加值高，用附加值高的制成品交换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表明宋代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三、在文化上，既要看到封闭保守、颓废安逸的“南宋遗风”，更要看到南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由于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派，大多患有“恐金病”，加之南宋要想收复北方失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确实存在着许多困难，收复中原失地的战争，也几度受到挫折，因此在南宋统治集团中，往往笼罩着悲观失望、颓废偷安的情绪。一些皇宫贵族，只要不是兵荒马乱，就热衷于享受山水之乐和口腹之欲，出现了软弱不争、贪图享受、胸无大志、意志消沉的“南宋遗风”。反映在一些文人士大夫们的文化生活中，就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的华丽浮靡之风。但是，这并不能掩

盖两宋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两宋文化。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日本学者则将宋代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这主要体现在:

1、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他认为“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使南宋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理学思想的形成。两宋统治者以文治国、以名利劝学的政策,对当时的思想、学术及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南宋是儒学各派互争雄长的时期,各学派互相论辩、互相补充,共同构筑起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理学思想中倡导的一种国家至上、百姓至上的精神,与孟子的“君轻民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两宋还倡导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就是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持尊奉的态度。出现了理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则从佛教中汲取养分,将其融入自身的养生思想,并吸纳佛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两宋“三教合流”的文化策略,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使宋代儒生不同于以往“终信一家、死守一经”,从而使得南宋在思想文化领域均有重大突破与重大建树。

思想学术界党派林立。党派林立是南宋学术思想发展的突出表现,也是当时学术界新流派勃兴的标志。在儒学复兴的思潮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政策下,先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南宋时期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约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为推动南宋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极力推崇义利统一,强调“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认为只有农商并重,才能民富而强国,实现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发展南宋经济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

2、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南宋文学艺术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一是宋词的兴盛。宋代创造性地开创了“词”这一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学形式。词的繁荣起始于北宋,鼎盛于南宋。南宋词不仅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而且艺术上更趋于成熟。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豪放词的最高代表,也是南宋词坛第一人,与北宋词人苏东坡一样,同为宋词最为杰出的代表。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易安体”,对后世影响很大。陆游既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南宋词坛的巨人,充满了奔放激昂的爱国主义感情,与辛弃疾一起把宋词推向了艺术高峰。二是宋诗

的繁荣。宋诗不但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诗双峰并峙,两水并流。三是话本的兴起。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极具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代话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南宋还创造了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四是南戏的出现。南宋初年,出现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感染力的“戏文”,统称“南戏”,南宋“戏文”是元代杂剧的先驱。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形式的成熟,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五是绘画的高峰。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我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宋代画家多达千左右,山水、人物、花鸟等并盛于世,宋代多位皇帝也都是绘画高手,南宋绘画以山水画最为突出,南宋山水画对后世影响极大。南宋当时画家称西湖景色最奇者有十,这就是著名“西湖十景”的由来。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艺史上的典范,为明清工艺争相效仿的对象。此外,南宋的书法、雕塑、音乐、歌舞等,也都有长足的发展。

3、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大力倡导学校教育,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使宋代的教育体制较之汉唐更加完备和发达。南宋官私学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使文化教育下移,教育更加大众化,适应了平民百姓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推动了文化的大普及,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南宋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鼎立并存,各类学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各州县普遍设立了公立学校,其学校规模、学校条件、办学水平,较之北宋有了更大发展。由于理学家的竭力提倡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南宋地方书院得到了大发展,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南宋私塾村校遍及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由城镇延伸到了乡村,南宋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

4、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南宋以“尊重和提倡”的形式,鼓励知识分子重视历史,研究历史,“思考历代治乱之迹”。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分别立目,完整地记载历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则开启了记述学术宗派史的学案体之先河。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南宋史学家不仅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而且力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历史上寻找兴衰之源,以史培养爱国、有用的人才。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四、在科技上,既要看到整个宋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也要看到南宋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杰出贡献

宋代统治集团对在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及创造、创新之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为宋代科技发展进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最大的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史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

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不少科技发明不仅在中国科技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号称第一。《梦溪笔谈》作者北宋的沈括、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两位钱塘人，都是中外公认的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巨匠。南宋的科技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其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1、南宋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的贡献。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等三大发明，在南宋时期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始见于北宋末期，南宋时的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指针，发展成为比较简易的罗盘针，并将它应用于航海上，这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李约瑟指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古代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推广，也始自南宋。南宋出现的管形火器，是世界兵器史上十分重要的大事，近代的枪炮就是在这种原始的管形火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南宋还广泛使用威力巨大的火炮作战，充分反映了南宋火器制造技术的巨大进步。南宋开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出现目前世界上第一部活字印本。此外，南宋的铜版印刷、造纸技术也更为发达，生产规模大为扩展，品种繁多，质量上乘。

2、南宋在农业技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南宋陈旉所著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他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陈旉在《农书》中首先提出了土壤肥力论等多种土地的利用和改造之法，并对搞好农业经营管理，也都提出了卓越的见解。稻麦两熟制、水旱轮作制、“耕耙耨”耕作制，在南宋境内都得到了较好的推广。植物谱录大量涌现。《橘录》是我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历史上一部最早的菌类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植物学辞典，比欧洲要早三百多年；《梅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梅花专著。

3、南宋在制造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宋代冶金技术，居世界最高水平，南宋对此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在有色金属的开采与冶炼方面，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在煤炭的开发利用上，南宋开始使用焦煤炼铁，而欧洲人是在十八世纪时才发明了焦煤炼铁，是我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南宋是我国纺织技术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生产工具丰富，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南宋的丝纺织品、棉纺织品、织造和染色技术在前代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南宋瓷器无论在胎质、釉料，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同时，南宋的造船、建筑、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技术水平，也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如石刻《天文图》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全天星图，《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图。

4、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南宋数学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也在世界数学史上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文早五百多年。南宋杰出的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间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我国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杨辉对级数求和的论述，使之成为继

沈括之后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人。杨辉发明的“九归口诀”，不仅提高了运算速度和精确度，而且还对我国珠算的发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约瑟把宋代称为“伟大的代数学家的时代”，认为“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

5、南宋在医药领域的重要贡献。南宋是中国法医学正式形成的时期。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三百五十余年。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我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南宋是中国针灸医学的极盛时期。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备急灸法》两书，皆集历代针灸学知识之大全，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南宋腧穴针灸铜人是针灸学上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陈自明所著的《外科精要》一书对指导外科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著名的妇产科著作，直到明清时期仍被妇科医生奉为经典。朱瑞章的《卫生家宝产科方》，被称为“产科之荟萃，医家之指南”。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刘昉的《幼幼新书》，汇集了宋以前在儿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儿科学著作。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著。

五、在社会上，既要看到南宋一些富豪官绅生活奢华、挥霍淫乐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政府关注民生、注重民生保障的一面

南宋社会生活的奢侈之风，既是南宋官僚地主腐朽的集中反映，也是南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我们既要看到南宋一些富豪官绅或“闲汉”们纵情声色、恣意挥霍的社会现象；更要看到南宋政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的客观事实。两宋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古代救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为宋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事业是从两宋开始的。同时，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逐步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逐渐冲破了宋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两宋社会结构开始调整重组，出现了各阶层之间经济地位升降更替、社会等级界限松动现象，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趋近，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明显。两宋社会的平民化，既体现在科举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取士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而且体现在官民之间身份可经相互转化，既可以由贵而贱，也可以由贱而贵；贫富之间既可以由富而贫，也可以由贫而富。具体表现在：

1、南宋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两宋时期，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租佃制下，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而不必承担其他义务。客户契约期满后有权退佃起移的权利，且受到政府的保护，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按照宋朝的户籍制度，客户直接编入国家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承担国家某些赋役，而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了很大的人身自由。两宋农民在法律上可以自由迁徙，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南宋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

2、南宋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受到社会的歧视。宋代商业已被视同农业，均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